

清代新疆军府体制下移民的政道与治道

高亚西

摘要: 汉前,新疆僻处西北,与中原交通阻隔。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的管控便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清廷在新疆实行军府体制的核心是在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直接把这一区域纳入统治版图,摒弃了以往的羁縻而治的策略,但其内在治理理路却是军府体制下的大量移民。清代对新疆的移民以军事移民为主,辅之以民间移民。这种举措,既迅速填补了战乱后的新疆地域空间,又通过开展大规模屯垦,切实取得了移民实边的成效。这种军府体制的移民举措为新疆提供了继往开来的治理路径,是国家施政方略与边疆治理政策的有机统一,至今对于新疆的治理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军府体制;边疆治理;移民;人口压力;清代

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26)03-0027-12

作者简介: 高亚西,宁夏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讲师,博士(宁夏 固原 756099)

DOI: 10.13484/j.cnki.ndxbzsb.20260304

关于清代在新疆施行的军府体制,学界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论述,肯定了军府体制对于治理新疆的重大历史意义^①。关于新疆的移民问题,学界也从各方面进行发覆,充分展示了军府体制时期的移民图景^②。然而从军府体制下的移民角度进一步挖掘清代对新疆的治理意蕴,尚缺乏足够的讨论。乾隆帝治理新疆推行的军府体制,突破了中央王朝传统的治疆策略,使新疆完全受中央管控,具有学界公认的里程碑式的意义。还有一个被学界忽视的问题是,新疆军府体制是在官方军事移民与民间移民基础上形成的。移民充实了新疆的地域空间,重塑了新疆的基本治理面貌,也为日益严峻的人地矛盾提供了疏解之法。这一移民举措,正是新疆军府体制能够成功实施的核心因素,也为后世提供了治理边疆的有效路径。笔者拟在前人对新疆军府体制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新疆军府体制下移民举措所蕴含的施政方略与治理政策,以期进一步深化学界对新疆军府体制的认知。

一、清代新疆军府体制与军事移民

汉武帝自派遣张骞凿空西域以后,便开始积极经略西北疆域。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廷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驻军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自此,西域正式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成为我国

- ① 武红薇、张杰:《略论清代在新疆设置军府制的历史作用》,《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华立:《新疆军府制下的理民体制与满汉员的任用》,《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聂红萍:《从甘肃总督到伊犁将军:乾隆朝对新疆治理的探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锋晖:《乾隆朝治理新疆制度的筹划与确立》,《西域研究》2019年第2期;王艺桦:《清代新疆军府制与行省制比较研究》,《新疆地方志》2020年第2期;许建英、刘志佳:《清朝新疆治理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3期;锋晖、马兰:《清代军府制度的再探讨》,《西部蒙古论坛》2023年第3期;王希隆:《新疆军府制的创立、发展与深化——以西汉、唐、清三朝为中心》,《西域研究》2024年第4期。
- ② 牛汝极:《从新疆地名看历史上的移民》,《西域研究》1992年第3期;张丕远:《乾隆在新疆施行移民实边政策的探讨》,《历史地理》1990年第3期;董琳:《清代移民屯田对新疆地名的影响》,《干旱区地理》1993年第4期;陈锋:《清代的移民与社会经济》,《长江文史论丛》2017年年刊;褚宏霞:《清代新疆军事移民落籍的相关问题探析》,《管子学刊》2019年第4期;董秋菊:《清代新疆移民的婚姻问题》,《兵团党校学报》2020年第4期;王玉平:《移民屯田与清代新疆国家认同路径研究》,《新疆社科论坛》2021年第1期;褚宏霞:《清代新疆军事移民行为下的防务建设探析》,《军事历史》2022年第1期。

领土的一部分。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汉廷又在车师国故地设置戊己校尉,专门屯田积谷,受西域都护节制。西汉在进一步完善管辖西域的制度设计时,也为后世管辖西域奠定了基本治理模式。而后,东汉、魏、晋、前凉、前秦、北魏、唐、元等政权基本上都沿袭了西汉军府体制的做法,设立军事机构对西域进行辖制。然而在这种军事控制模式下,当地驻扎人数有限,且受中央与周边诸政权关系的影响,所以西汉自控制西域以来,并未能直接统治新疆。

元明鼎革后,终明一代不仅未能统合蒙古诸部,而且不得不设置九边重镇屯戍重兵,与蒙古部落始终处于军事对抗之中。明代前期明廷尚能在西北疆域控制哈密,但在嘉靖中期最终退守嘉峪关。在清入关前后,西北的厄鲁特蒙古日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自噶尔丹成为准噶尔部首领以来,通过东征西讨建立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成为清代西北边防的巨大威胁。康熙、雍正两朝与准噶尔汗国交战数次,双方各有胜负。清廷因此只能在甘肃驻守大量军队,“兵额独多于他省”^①,进行军事防御,并为此耗费大量粮饷。这些变化表明,中央政府需要对西域进行强有力的控制,既往的边疆治理方略需要进行更张与改进。

自准噶尔汗国第三代首领噶尔丹策零病故后,准噶尔汗国一直处于严重内乱之中。乾隆十九年(1754年),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率众归附清廷后,极力向乾隆帝提议趁准部内乱出兵西域。次年春,阿睦尔撒纳被授予定边左副将军并率领清军进攻伊犁,讨伐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在清廷出兵之际,乾隆帝指出,此次出兵的意图和战略目标“特为平定准噶尔,将阿睦尔撒纳等四卫拉特封为四汗,俾所部咸登衽席”^②。可见,乾隆帝起初是想通过分封众建的方式使新疆地区名义上归顺成为藩属国。这个政策的实施,是历代王朝对新疆一贯采取分而治之羁縻之策的结果,也符合新疆当时的实际情形。但是这种规划只是削弱了准噶尔部的势力,并未建立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直接政治管理体制,也未消除引发日后动乱的隐患。正如魏源所言:“四汗分建,亦必不数年一反,十数年一反,王师旋罢旋兴,仍同康熙、雍正中已事,安能者定百年,一劳永逸?”^③

清军在擒获准噶尔首领达瓦齐后,阿睦尔撒纳意欲自立为四部总汗,遂又发动反清叛乱,乾隆帝不得已二次出兵。这之后,北疆的人口规模有所削减:“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编设佐领昂吉,此外数千里外,无瓦刺一毡帐。”^④在平定叛乱后,面对北疆“千里空虚,渺无人烟”^⑤的局面,对于新疆地区的控御问题又成为朝廷的重要议题。以大学士史贻直为首的诸多朝臣仍持有放弃伊犁的主张,认为“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⑥。但乾隆帝此时已下定决心要把新疆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并表明,经过二次征伐后,“卫拉特之众,诛剿者诛剿,病亡者病亡,即蠲而畀之一人,且无可授之者,此或者上天将以全部卫拉特,赐我国家耳”^⑦。于是,乾隆帝取消了先前“将车凌(杜尔伯特部首领)等分驻游牧,众建以分其势”^⑧的打算,开始设立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统兵大员,统率驻守军队,积极开展屯田活动。

在清廷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之际,南疆大小和卓也兴兵叛乱,意图割据南疆。起初大小和卓假意归顺时,乾隆帝打算“令为回人头目”^⑨管理南疆,乾纲独断移师南疆,并在荡平南疆后,彻底把新疆全境纳入清统治版图。然而,采取何种措施治理新疆,又成为乾隆朝君臣的重要议题。乾隆二十四年(1759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37卷,中华书局,1998,第4066页。

② 郭平梁、纪大椿原辑,周轩、修仲一、高健整理订补:《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二)》,新疆大学出版社,2017,第813页。

③ 魏源:《圣武记》第4卷,韩锡铎、孙文良点校,中华书局,1984,第156页。

④ 魏源:《圣武记》第4卷,第156页。

⑤ 七十一:《西域总志》第2卷,成文出版社,1966,第134页。

⑥ 魏源:《圣武记》第4卷,第158页。

⑦ 郭平梁、纪大椿原辑,周轩、修仲一、高健整理订补:《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三)》,第1200页。

⑧ 《高宗纯皇帝实录(六)》第464卷,中华书局,1986,第1018页。

⑨ 《高宗纯皇帝实录(八)》第555卷,第25页。

年)七月,陕甘总督杨应琚奏请:“西陲平定,幅员广大,陕西甘肃非一总督所能兼理,请将西安总督改为川陕总督,四川总督改为四川巡抚,甘肃巡抚改为甘肃总督,管巡抚事。”^①乾隆帝同意了杨应琚的奏请,调整了川、甘、陕三省的管理体制。可见,乾隆帝也有意在新疆全面施行郡县管理,随即改任杨应琚为甘肃总督,驻扎肃州,“实为恢廓甘域之计”^②。在择选甘肃总督驻扎地时,乾隆帝指出:“总督驻扎地方,关系控制西陲,事体崇重……殊不知就甘肃内地而论,则凉州固为适中。若就统驭新附各部落而言,则肃州犹为近地,而凉州则相距转遥。”^③这说明,乾隆帝起初也意欲对新疆实行郡县制,把新疆纳入甘肃辖境。

然而次年五月,乾隆帝又取消了上述计划,指示道:“新辟疆土,如伊犁一带距内地穹远,一切事宜,难以遥制。将来屯田驻兵,当令满洲将军等前往驻扎,专任其事。固非镇道绿营所能弹压,亦非总督管辖所能办理”^④,于是谕令将杨应琚管辖范围扩至乌鲁木齐。十二月,乾隆帝又进一步指出,“新辟各处,俱有大臣驻扎,无须更设道员”^⑤,正式发布谕令,取消陕甘总督的体制更张。乾隆帝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疆的实际情况,“若添设镇道以下各官,既与口外体制不符,而一切建造衙署,添设俸工,俱从内地经理,更滋烦费。且回众不相浹洽,易起猜疑,殊未妥协。”^⑥这奠定了新疆实施军府体制的基础。

在清廷平定叛乱的过程中,虽然准噶尔部落民众大量殁于战火与疫病,但杜尔伯特、和硕特诸部尚有一定数量的牧民,且新疆西边的布鲁特、哈萨克的牧民经常越界放牧,所以乾隆帝认为,若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后不加以驻兵戍守、屯垦,“倘被布噜特等侵占又需经理。朕意于伊犁等处驻扎索伦兵及健锐营兵二三千名,合之绿旗屯田兵丁,声威自壮”^⑦。乾隆帝的考虑极富远见,因为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月布鲁特使臣觐见乾隆帝时,便提出“旧游牧垦请赏给”^⑧的请求。乾隆帝通过驻兵屯垦的方式填补了准噶尔汗国覆亡后的权力真空,断绝了布鲁特、哈萨克等中亚游牧民族的越界。同时,俄国也觊觎新疆。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统一新疆时,沙俄“已将其侵略势力扩展到塔尔巴哈台山和萨彦岭一带”^⑨。在阿睦尔撒纳失败遁逃到俄国后,俄国给予其政治庇护,拒不将其交还清廷。面对新疆周遭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清廷不得不派驻强军予以威慑。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明瑞作为首任伊犁将军,“统掌新疆之军政,山北山南皆听节制”^⑩。由此,清代正式在新疆施行了军府制度,这也是初期保障新疆稳定的重要治理制度。由于受持续的动乱与天花疫病的影响,新疆人口流失严重。军府体制下的军事移民,成为新疆移民的制度性举措,进而迅速充实了新疆的地域空间。乾隆二十九年(1764—1769年),清廷从察哈尔、盛京、黑龙江、甘肃、陕西和热河等地抽调的满洲八旗、蒙古、锡伯、索伦、达斡尔等官兵陆续移驻伊犁,原来的伊犁领队大臣分为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五员领队大臣。起初,屯垦驻防的绿营兵定期从陕甘选派进行换防,但由于定期换防耗费巨大且烦琐,所以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起,朝廷逐步把新疆驻防绿营兵丁改为携眷永久驻防,“携眷永居,不但有裨屯田实效,将来子弟多添设土户,亦复有益边疆”^⑪,绿营兵由此成为制度性的军事移民。驻扎伊犁的军队分为伊犁惠远城满营、惠宁城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厄鲁特营、察哈尔营,还有一镇绿营,军队总额近18000人。这一携眷永久驻防举措是对前朝驻防军事体制的极大更张,有效稳固了清廷在新疆的直接统治。

① 郭平梁、纪大椿原辑,周轩、修仲一、高健整理订补:《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三)》,第1462页。

② 吴廷燮:《中国地方志集成·新疆府县志辑》第7册,凤凰出版社,2012,第583页。

③ 《据鞍录(外一种)》,杨应琚、汪受宽校注,青海人民出版社,2024,第255页。

④ 郭平梁、纪大椿原辑,周轩、修仲一、高健整理订补:《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三)》,第1561—1562页。

⑤ 郭平梁、纪大椿原辑,周轩、修仲一、高健整理订补:《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三)》,第1600页。

⑥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1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66—8667页。

⑦ 《高宗纯皇帝实录(八)》第560卷,第95页。

⑧ 《高宗纯皇帝实录(八)》第572卷,第264页。

⑨ 管守新:《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第37页。

⑩ 《清朝通典》第37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第2219页。

⑪ 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第662页。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初,已经移牧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万里东归。清廷为此采取了周密的赈济、安抚措施,并且在新疆为其划分了游牧区域。然而面对数万牧民,增加兵力进行防备,以及调整驻防布局势在必行。伊犁将军舒赫德奏请道:“塞外各地均有驻兵,故在凉州、庄浪不必永久驻兵,即请全数移驻乌鲁木齐。”^①乾隆帝同意了舒赫德的奏请,并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三十八年(1773年)分两次将满洲、蒙古八旗官兵3300余名移驻乌鲁木齐,加上家属共约15000口^②。该措施的施行,有效巩固了清廷对新疆的治理。

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认为,“今乌鲁木齐所属地方宽阔,而距伊犁遥远,兵民辐辏,应办事件甚繁”^③,遂改乌鲁木齐参赞大臣为乌鲁木齐都统,“驻扎巩宁城,辖满汉文武官员,督理八旗绿营各军,总办钱粮事件”^④。在军队驻守上,乌鲁木齐辖区有乌鲁木齐满营、巴里坤满营、古城满营、吐鲁番满营,外加乌鲁木齐提督、巴里坤镇总兵等绿营官兵,总计约2万人。乌鲁木齐都统辖区成为伊犁将军直辖区外的另一个军府,乌鲁木齐也成为伊犁之外的新疆东部军政中心^⑤。自此,清廷在新疆建立的两军府四军政区的军府体制基本完备。

新疆北部是游牧区,缺少城池,于是清廷移驻了大量八旗、蒙古、绿营等兵丁及其家属,加快城池修筑。伊犁本是“空旷之地,并无城垣”^⑥,但在其成为军政中心后,便陆续修建了惠远城(伊犁将军驻扎城池)、惠宁城、绥定城、广仁城、宁远城、瞻德城、拱宸城、熙春城、塔勒奇城。乌鲁木齐作为新疆东部的军政中心,也修筑有巩宁城(乌鲁木齐都统驻地)、迪化城(乌鲁木齐提督及属下参将等驻地)、辑怀城(古木地地区)、阜康城(特纳格尔地区)、昌吉城(洛克伦地区)、绥来城(玛纳斯地区)、会宁城(巴里坤地区)、孚远城(古城地区)等城郭。塔尔巴哈台地区修筑有肇丰城(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驻地,后移驻绥靖城)、绥靖城,还有许多用于驻兵屯田的小型城堡,如惠徕堡、屡丰堡、宣仁堡、怀义堡、乐全堡、宝昌堡等,其他地区也纷纷修建大大小小的城池。这些城池和城堡的修建为携眷驻防的官兵提供了安适的场所,迅速容纳了大量迁徙人口,也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根基。

清廷先后在新疆地区派驻了近4万名永久驻防兵,连同眷属,总人口近25万人^⑦。新疆成为清廷在京外驻防军队最多的地区之一。这些驻防官兵既要守卫城池、驻守卡伦与军台、巡查边界、屯垦生产、定期训练,也要承担定期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军政区的防守任务。这些军籍人口构成了清廷维系对新疆广大地域管治的核心力量,“肩负起了巩固边防与建设地方的双重任务”^⑧。毋庸置疑,清代在新疆实施的军府体制“不仅保持了新疆长期稳定发展的局面,而且为近现代中国对新疆的治理开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⑨。

新疆“东扞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蔽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⑩,在西汉与匈奴对抗之时便已凸显重要战略地位。有效治理新疆能为中原腹地提供安全屏障。清廷消灭准噶尔汗国后,直接将该地区纳入版图,并将政治势力辐射到中亚诸国,从地缘上构成了清代西北国防的屏障。正如乾隆帝所言:“自古未通中国之哈萨克亦皆称臣纳贡,其于我皇清疆域式廓万年久安之道,为有益?为无益?朕亦不更置论。”^⑪彼时俄国向中亚扩张,而清廷统一新疆的做法“对于蓄谋鲸吞中国西北地区的沙俄侵

① 吴元丰:《满文档案与历史探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5,第275页。

② 吴元丰:《满文档案与历史探究》,276页。

③ 《高宗纯皇帝实录(十二)》第935卷,第582页。

④ 和宁:《三州辑略》,成文出版社,1968,第32页。

⑤ 王希隆:《清代乌鲁木齐都统述论——兼论清代新疆两军府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4期。

⑥ 《高宗纯皇帝实录(七)》第509卷,第434页。

⑦ 褚宏霞:《清代新疆军事移民行为下的防务建设探析》。

⑧ 管守新:《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研究》,第19页。

⑨ 武红薇、张杰:《略论清代在新疆设置军府制的历史作用》。

⑩ 王树柎、曾少鲁总纂,朱玉麒整理:《新疆图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页。

⑪ 《高宗纯皇帝实录(八)》第555卷,第17页。

略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①。

然而新疆远僻内陆,远离政治中心,且与内地交通不畅,所以对新疆是否使用大规模军事力量,历代王朝态势不一:从国防角度看,支持者有之;从“耗中事边”^②角度,极力反对者也有之。如东汉时期关于西域都护的存废问题,“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③。由于西域距离中原遥远,且属于游牧区域,存在诸多阻碍问题。一是,驻守军队不能过多,否则即便就地屯垦,也难以有效满足守军的粮食供应,若从内地转运,则耗费巨大。二是,军队需要定期换防,长途来回调动也耗费巨大。而清代的八旗驻防具有天然优势,分为驻京八旗与京外驻防八旗。京外驻防八旗士兵携眷永久定居驻防所在地,所以对于驻防新疆的八旗而言,无所谓地域远近,驻防地即是户籍所在地,且清代八旗本身就是兵民合一的组织,平时从事生产,战时随同作战。所以清代的军府体制有效兼顾了二者的平衡,在确保国防的同时,也通过军事移民大兴屯垦的途径解决了国力耗费的问题。清代宗室昭槿赞誉道:“国家驻防之兵,最为良制,精选虎贲劲旅,屯戍四方,督其操练,严其律令,有四方稍有不靖,自可驱除,不须远方调拨,以误时日。”^④

二、清代的人地矛盾与移民就食新疆的举措

随着社会动乱与王朝更迭,中国历代人口呈现出上下起伏的变化,其中人地矛盾始终是导致动乱的关键因素。17世纪初,中国人口达到2亿,刷新历史纪录,人地矛盾越发凸显。明末清初持续的动乱,导致人口锐减,但在清代统治者稳固统治秩序后,承平日久,人口急剧增长。乾隆六年(1741年),朝廷首次全面统计全国人口实数,“会计天下民谷数,各省通共大小男妇”^⑤已经超过1.4亿人。持续的人口增长也使得人均耕地亩数逐渐下降,加剧了粮食生产、供应与庞大人口规模之间的矛盾,所谓“盛世滋生人口日众,岁时丰歉各处难一,以有限有则之田土,供日增日广之民食,此所以不能更有多余”^⑥。

自乾隆朝始,民众面对人地矛盾的状况,自发流转迁徙。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贵州巡抚周人骥向乾隆帝奏请:“各省流寓民人入川者甚多,请设法限制。”^⑦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人口迁徙问题已经引起了边疆大吏的重视,并成为上报中央政府的重要事项。对于周人骥禁止民众自发迁徙的奏请,乾隆帝批评他不仅有拂人性,尚恐引发事端。乾隆帝也深知人口剧增会加剧人地矛盾,于是谕令道:“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计难以自资,不得不就他处营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岂有自舍其乡里田庐而乐为远徙者,地方官本无庸强为限制。”^⑧

新疆被收复后,清朝的版图基本确定下来。乾隆帝针对此事进一步指出:“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西陲平定,疆宇式廓。辟展、乌鲁木齐等处在于屯田,而客民之力作贸易于彼者日渐加增。将来地利愈开,各省之人将不招自集,其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⑨于是,清廷在进行军事移民的同时,也谕令官府组织穷苦人民迁往新疆屯垦。然而朝臣对移民新疆的举措看法不一,诸多朝臣对军队驻守尚持有异议:“时西域初定,地方万余里,伏莽尚众,与俄罗斯邻。上诏统兵诸大臣议,咸谓沙漠辽远,牲畜凋耗,难驻守。”^⑩甚至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63页。

②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105页。

③ 范晔:《后汉书》第88卷,中华书局,1965,第2912页。

④ 昭槿:《啸亭杂录》,何英芳点校,中华书局,1980,第338页。

⑤ 《高宗纯皇帝实录(二)》第157卷,第1256页。

⑥ 魏源:《皇朝经世文编》第39卷,载《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魏源全集》第15册,岳麓书社,2004,第232页。

⑦ 《高宗纯皇帝实录(八)》第604卷,第786页。

⑧ 《高宗纯皇帝实录(八)》第604卷,第786页。

⑨ 《高宗纯皇帝实录(八)》第604卷,第786页。

⑩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18卷,第10738页。

廷试中,尚有士子“公开声称西北屯垦是劳民行为,对移民提出异议”^①。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全国人口已经突破2亿。人口的急剧增长致使人地矛盾愈加凸显,越发成为社会问题产生的核心因素。同时,新疆地广人稀,仅依靠士兵携眷驻守及屯垦,无法填补大量劳动力缺口,所以迁移民众至新疆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策略。乾隆帝明确提出了移民新疆的益处:“原议招募内地民人前往耕种,既可以实边储,并令腹地无业贫民,得资生养繁息,实为一举两得。”^②由于新疆路途遥远且交通阻隔,内地百姓无力负担长途迁徙,清廷便通过提供路费、车辆、口食、衣服等“官为资送”的方式,有组织地把他们迁往新疆。他们到迁入地后,新疆官府以提供住房、分配牲畜农具、借给籽种口粮等措施保障其迁入后的生活,并且每户拨地30亩,6年后开始升科纳粮^③。这些措施很快便吸引了一些穷苦民众移民新疆屯垦。

关于乾隆二十六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61—1780年)20年间的人口迁移,华立著述的《清代新疆社会变迁研究》列有详尽的表格^④。这一时期人口的主要迁入地以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区为主,“总数达到一万多户,男女老少共四万多人”^⑤。又据相关学者研究,这一时期内地民众“民屯屯户已达一万七千二百户,共七万二千二百余人,其中大多数自招募而来”^⑥。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安排两批安南(今越南)难民到乌鲁木齐进行屯垦,也便有了“安南工”的地名^⑦。乾隆帝把远在西南的越南难民送往新疆屯垦,也是基于内地人地矛盾突出,而新疆又需要大量民众进行土地开发的考虑。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后,移民“转为自发迁徙为主,但移民之势已成,即使没有官方资助迁徙,内地户民也纷纷前往乌鲁木齐、巴里坤地区承垦落居”^⑧。

清廷除了组织普通百姓移居外,还推出令遣犯携眷移民新疆进行屯田的政策。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开始,朝廷便将先前流放吉林、黑龙江的重犯改为发配新疆巴里坤。这些罪犯便成为绿营屯兵的奴隶,随同耕作。由于劳动力不足,清廷便准许罪犯携带家眷,给地5亩,自行耕种。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后,清廷又进一步放宽政策,不仅对愿意陪同罪犯的眷属采取官为资送的方式,而且对屯垦新疆的罪犯采取缩减刑期、降等刑罚、落籍为民的鼓励政策,使罪犯能积极主动接受发配新疆。次年,军机处向乾隆帝奏报道:“伊犁、乌鲁木齐等处前因新疆屯田需人耕牧,是以于内地军流人犯内酌其情节较重者奏准改发定例以来,每年各省改发不下六七百名,积而愈多”^⑨,进而奏请修改相关优待发配新疆的罪犯条例。据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统计,仅伊犁一处遣犯“积有三千数名”^⑩,再加上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的遣犯及眷属,总计应当不下万余名。在军府体制下,这些遣犯和眷属不仅增加了新疆的人口数量,也扩大了新疆的屯垦规模。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新疆第一部官修通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就提到了收复新疆20余年后的人口繁盛情况:

前者准夷底定,扫穴犁庭,逆者剿之,顺者抚之。袤延万里,疆宇廓清。爰为屯兵驻守,招集回部及甘州民户,分地而居。而于乌鲁木齐、昌吉、罗克伦、伊犁诸处,计亩耕作。盖屯垦之丁男,即西域之户籍也。回部虽村落络绎,棋布星罗,几于烟火相望。然辟展左右,其居民先经避患,空城内徙。全部归诚后,于辟展、哈喇和卓、托克三、哈喇沙尔诸处,亦如准噶尔部之移民开屯,渐归殷庶。从此天山南北,一

① 华立:《清代新疆社会变迁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第21页。

② 纪大椿、郭平梁原辑,周轩、修仲一、高健整理订补:《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四)》,2017,第1957页。

③ 张丕远:《乾隆在新疆施行移民实边政策的探讨》。

④ 华立:《清代新疆社会变迁研究》,第23—26页。

⑤ 牛汝极:《从新疆地名看历史上的移民》。

⑥ 张丕远:《乾隆在新疆施行移民实边政策的探讨》。

⑦ 弓月:《新疆发现的越南钱及其来源探讨》,《中国钱币》1996年第4期。

⑧ 褚宏霞:《清代新疆军事移民落籍的相关问题探析》。

⑨ 《高宗纯皇帝实录(十)》第782卷,第619—620页。

⑩ 《高宗纯皇帝实录(十五)》第1175卷,第978页。

体涵濡。休养生息,日以繁滋,计口宜什倍于此,而目前固未为定额也^①。

此书对人口的增殖规模虽有所夸大,但相较于收复之时确实增长尤多,已经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移民涌入后,不仅开发了农业,也发展了当地的商业、手工业。陕甘总督文绶就嘉峪关外所见向乾隆帝奏道:巴里坤“屯田甚广,颇为丰美。城关内外,烟户铺面比栉而居,商贾毕集……奇台、东格根吉布库,官兵屯田万有余亩,内地商贾、艺业民人俱前往趁食,聚集不少”,乌鲁木齐“地土肥美,营屯地亩,日以开辟,兵民众多,商贾辐辏,比之巴里坤城内,更为殷繁……即昌吉、瑚图壁、玛纳斯等处,其地肥水饶,商贾众多,计与乌鲁木齐相似”^②。可以看出,移民屯垦深刻改变了新疆北部以游牧为主的经济结构,“对促进北疆地区社会生活面貌与内地趋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③。

由于清代统治者对新疆施行重北轻南的治理策略,直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才允准南疆换防官兵携眷。南疆主要由总理各城事务的参赞大臣,以及各城办事大臣、领队大臣驻守,具体事务分属名目繁多的伯克直接办理。这些管理举措使得南疆在被收复后并未发生大的动乱,即使有过乌什事变、张格尔之乱等动乱,也能及时平定。在安定的环境下,南疆的人口也随着全国人口的增长而持续增长。按苗普生研究,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即对南疆缠回(今维吾尔族)进行人口统计。按统计结果的修正与推算估量:“清初维吾尔族人口约计 24 万左右,即便再加上因逃避赋役而隐匿的户口,也不会超过 25 万。”^④至道光十一年,即达到了 65 万人口。虽然南疆维吾尔族的人口数量增长缓慢,但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新疆现存的一些地名可以看出移民的痕迹,许多村庄直接以移民原籍进行命名(表 1)。

表 1 新疆地名中包含移民户籍地的村庄^⑤

地区	村庄名称
乌鲁木齐	兰州湾子村、宁夏湾村
镇西	威武户庄、东敦煌庄、西敦煌庄、玉门庄
昌吉	兰州湾子、凉州滩、凉州渠村、河州工村、河州工庄、广东户工庄、兰州湾工庄
绥来	凉州户庄、苍浪户庄、广阳户庄、甘沟庄、甘沟新户庄、庆阳户庄、庄浪庙庄、兰州湾庄、宁夏工庄、广东迪庄、肃州户庄
迪化	广东户庄、兰州湾子村、宁夏湾村、广东庄子
玛纳斯	兰州湾乡、兰州湾村、下兰州湾、凉州户乡、凉州户村、东凉州户、西凉州户、庄浪户村、山丹户村
呼图壁	宁州户村、林州户村、镇藩户村
托克逊	安西村
吉木萨尔	庆阳湖村、东庆阳湖、西庆阳湖、武工街
沙湾	肃州户村
奇台	镇藩街
米泉	陕西工

资料来源:牛汝极:《从新疆地名看历史上的移民》;董琳:《清代移民屯田对新疆地名的影响》;李德龙:《〈新疆四道志〉校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

在乾隆年间,中国人口仍呈指数性增长,致使人地矛盾日益严峻。乾嘉时期官员洪亮吉就指出:

① 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第 461 页。

② 魏源:《皇朝经世文编》第 81 卷,载《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魏源全集》第 17 册,第 431-432 页。

③ 王玉平:《移民屯田与清代新疆国家认同路径研究》。

④ 苗普生:《清代维吾尔族人口考述》,《新疆社会科学》1988 年第 1 期。

⑤ 由于地名的时间不能全部考证,部分地名有可能是建省后得名。

“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不啻增二十倍焉。”^①嘉道年间,龚自珍、魏源等学者面对生齿日繁、人口压力日益加剧的状况,皆提出朝廷移内地之民以谋生新疆的见解。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提出了改置新疆为行省、招募内地贫穷民众迁徙新疆的建议,“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以耕以牧,得长其子孙哉!当行者,官给每户盘费若干”^②。魏源在《圣武记》中也指出,面对中国“户口日盛,中国土满人满”的严峻状况,地广人稀的新疆便是“天留未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息尾闾者也”^③。可以说,新疆在当时已具有缓解内地人口压力的战略地位,然而在交通运输条件落后及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移民新疆的速度要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

三、新疆军府体制下的移民与边疆治理对后世治疆的路径启示

自夏朝建立国家治理体制以来,中国疆域便开始经历由小至大逐步扩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国家治理体制不断健全的过程,也是社会先进生产力与文化向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治理方式而言,夏、商、周三代主要以天下共主的方式建立了中央政权,以分封诸侯的方式实现了疆域的扩张与地方治理。这一时期也形成了认知观念统一的华夏族群。秦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在地方实行了郡县制。秦朝由此奠定了中国大一统国家初期的基本疆域,这一版图主要局限在中原农耕区域。汉朝建立后,在汉匈战争的过程中,开始经略西域。自秦汉始,历代政权“将自己疆域的边缘部分区分出来,采取专门的政策和措施进行有针对性的统治和治理,因而开边疆制度的先河,成为世界上最早建立边疆制度的国家”^④。

对新疆的治理,从汉代一直延续至清代统一新疆、设立军府体制。军府体制虽有弊端,却在统合地域广大的新疆方面卓有成效。新疆虽然建立了军府体制,但内部还存在着郡县制、札萨克制、伯克制等多元治理模式。乾隆帝施行军府体制是对之前历代王朝统辖西域经验的总结,并做了改进。这种治疆举措,充分体现了清代“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⑤的治边方略。清代军府体制与之前治边方略的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把新疆纳入全国统一的版图而非采取羁縻而治的政策,二是通过大量的军事移民和民间移民填充了新疆的地域空间。

新疆远僻边陲且地域辽阔,再加上周围诸多势力,若驻守大量军队,那么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军队驻守过多会导致粮饷难以供给,中原财力也会被大量耗费。若中央政权稳固且强大,尚能保证持续供应,一旦中央政府衰弱,便不能兼顾,所以时任伊犁参赞大臣阿桂言道:“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⑥清廷通过驻防八旗的国家体制,既能迅速从各地抽调八旗官兵携眷迁到新疆,以人口填充的方法解决由于战乱导致的新疆人口稀少问题,又能以军事力量直接掌控新疆,把新疆纳入统治版图,还取代准噶尔汗国,成为中亚新的权威中心,拓展了清廷的国防纵深。这是清代军府体制的一大优势——能够大量驻军。

如果军食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驻军越多,中央财政的负担就越重,且驻军还要承担防卫任务,所以必须大兴屯田,并迁移大量民众进行专门屯垦来填补劳动力缺口。早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考察新疆屯田事宜的都统范时绶面对地利未尽、供应不足的状况,向乾隆帝奏道:“敕下陕甘总督,将新辟疆土详加妥议,作何招民开垦纳粮,不致各省岁岁协拨,为一劳永逸之举,俾兵无冗食,边疆永定。”^⑦而在乾

① 洪亮吉:《洪亮吉集》第1册,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2001,第14页。

②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107页。

③ 魏源:《圣武记》第4卷,第158-159页。

④ 周平:《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第7页。

⑤ 祁韵士、张穆改定,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3页。

⑥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18卷,第10738页。

⑦ 华立:《清代新疆社会变迁研究》,第20页。

隆帝统一新疆的前后,也是中国人口跨越式增长的时期,这使得清代的人地矛盾愈加凸显。清廷为解决这一矛盾,通过官方组织移民的方式,迁徙内地贫苦民众至新疆。这既缓解了内地人口压力,充实了新疆的地域空间,又推动了新疆屯垦的开展,解决了军民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

清廷采取“屯垦开发,以边养边”^①举措,开展大规模的屯垦活动,形成了兵屯、民屯、犯屯、回屯、旗屯、商屯六类屯垦形式。这些多样的屯垦活动,使新疆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无需清廷从内地往新疆调拨粮食。

《西域图志》中记载了清代的屯政之善:

筹边之策,将使兵食兼足,舍屯政无由。第时异势殊,泥古者或乖实用,则随宜立制之道尚焉。汉晁错建议募民徙塞下,已兆屯田之法。至宣帝遣故将吏屯田张掖,而屯政日开。自时厥后,若击先零、讨李宪、取伊吾、复三郡,凡有军兴,必修屯政。然而师行则举,师旋则废。议者徒备一时权宜,而未得经久承行之利。魏晋以降,间或行之内地,亦旋兴旋罢,立制鲜筹尽善……调派武职以专其成,特置重臣以董其事。良法美意,旷古罕闻。窃谓西域屯政之善,实有所以超汉轶唐者……今则且耕且驻,无俟招集流亡。在兵在民,不必官支农具。史书俵牛括牛之弊,种种俱绝。不惟腹地不资转运,而给饷之羨,陈陈相因,减费更广。无他,汉唐之屯政,专为养兵,而未能兵民相济。汉唐之屯政,专为供战,而未能战守兼宜^②。

由此可以看出,历代治理边疆无不首推屯田,屯田是边疆治理的重中之重。清廷能够实施军府体制治理新疆的一个核心因素,便是迁徙大量携眷定居的劳动力进行屯垦。可以说,“屯田兴,边境宁;屯田废,边境乱。这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历史演变问题”^③。

新疆军府体制是清代在统一新疆初期采取的最为有效的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确保了新疆内部和边防的稳定。然而随着新疆人口的日益增多,军府体制“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④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后来,随着清代国势衰微,以及西方工业革命的开展,中西差距日渐拉大。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攫取侵略权益。如俄国凭借地缘优势,重新开始了对中国东北、西北地区的侵略。其实早在清入关之时,俄国便已“极力通过和平手段把卫拉特王公和执政者变成俄国的臣民,把从属于这些王公和执政者的居民变成替俄国国库提供实物税的属民,并把他们居住的地区变成俄国的领土”^⑤。后来由于清廷在新疆施行了军府体制,才有效遏制了俄国在西部疆域的扩张。

然而晚清时期,由于国力日渐衰落,俄国侵占了我东北地区 100 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后,也开始蚕食新疆地区。同治十年(1871 年),沙俄更是趁新疆爆发大规模反清起义及阿古柏入据新疆建立伪政权之机,直接出兵侵占伊犁地区。新疆的军府体制也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走向瓦解,“哈密以西各满营旗丁,乱后孑遗仅存,旧制万难规复”^⑥,取而代之的是行省体制在新疆的全面推行。行省体制的建立是对新疆治理的进一步优化,是对“传统的边疆治理理念及统治措施的重大变革和有效尝试,是对边疆治理制度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措施”^⑦。然而新疆当时的核心问题始终是人口短缺问题,经过十余年动乱后,人口又急剧下降,“满汉孑遗之民,则两路均寥寥无几”^⑧。无论是军府体制还是行省体制,都以大量的人口进行物质生产作为支撑,这样才能在实现自身运转的同时,兼顾国防重任。所以在军府体制“前期的移民成果几乎尽毁”^⑨的情况下,积极吸纳外来移民仍是新疆建立行省制后的施政重任。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地缘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外来侵略逐步侵蚀了国内的资源、冲击了统治政权。清廷也明白移民实边的国防意义,所以全面放开了东北、内蒙古地区的移民限制。东北、内蒙古地区比新疆更具有便利的地理位置和优渥的生存环境,在原有移民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诸多省份的移民迁

① 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第 439 页。

② 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第 449 页。

③ 李福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第 1 页。

④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七》,刘泱泱等校点,岳麓书社,2009,第 173 页。

⑤ 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修订版)》,马曼丽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第 119 页。

⑥ 刘锦棠、李续宾:《刘锦棠奏稿·李续宾奏疏》第 3 卷,杨云辉校点,岳麓书社,2013,第 93 页。

⑦ 阿地力·艾尼:《清末边疆建省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第 117 页。

⑧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张静庐等点校,中华书局,1958,第 1089 页。

⑨ 褚宏霞:《清后期新疆移民落籍方式的嬗变》,《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

人,“走西口”与“闯关东”便是那一时期移民高潮的体现。而新疆的移民绝大多数来自甘肃,“甘肃因离新疆较近,加上自乾隆以后甘肃人地矛盾已十分尖锐,所以自愿移往新疆的民人,基本上是来自甘肃。甘肃成为新疆移民最主要的来源地,占整个新疆移民数的80%以上”^①。但对于甘肃而言,人口也多由其他地区移民而来,同样面临着人口短缺问题,所以其民众移民新疆无以为继。自清廷官为资送移民停止后,新疆的外来人口迁入数量便明显减少。至宣统年间,新疆全省有471 205户、2 085 340人^②。

民国时期,新疆都督杨增新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致使新疆十余年来“全省人口增长以本地区自然增长为主,人口分布格局与清末相比并无太大变化”^③。金树仁及盛世才上台后,改变了新疆自身孤悬塞外的局面,加强了其与内地的联系,放开了对移民的限制。然而由于民国政府中央权威不振、地方军阀割据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等诸多因素,导致国贫民穷及动乱频仍,所以尽管北洋政府连同国民政府一直筹划开发西北,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报刊、杂志也极力呼吁内地民众向新疆移民垦殖,但新疆的开发收效甚微,人口短缺状况未能得到改善,至1948年全省人口才400余万。这说明,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政令统一的中央政府的统一调配,新疆的发展始终会受限于人口短缺。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正式担负起新疆治理与发展的领导重任。1949年9月新疆宣布和平解放,10月初王震即率领解放军挺进新疆。朱德在25日致信王震:“新疆地广人稀,不能供应大军……如不提倡生产,将不能自存,更不能维持秩序,这是明显的事情。”^④12月5日,毛泽东同志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〇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⑤1950年,全疆部队响应中央指示:“十九万三千人……必须发动十一万人到开垦种地的农业生产战线上去。”^⑥1952年2月,毛泽东同志签署《中央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将部分解放军部队改编为经济建设部队。1954年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简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告成立,成为屯垦戍边、寓兵于民,平时搞生产,战时能打仗的“准军事实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初建时有17万人,后来人民解放军复员转业官兵、全国各地的支边青壮年、知识分子志愿奔赴新疆,又进一步扩大了兵团的规模。截至第二次人口普查的1964年底,兵团人口达113万余人^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新疆的军人直接转业携眷成为新疆居民。通过号召军队驻防与屯垦,既迅速扩大了新疆的人口规模,又解决了战争结束后驻疆军人转业安置问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的大规模工农业生产,既能自给自足,又能发展新疆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共成立了12个生产建设兵团和2个建设师,至今只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留存^⑧。这与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宗教信仰氛围、国际地缘环境等都有紧密的关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中央治理新疆的重

① 霍维洮、胡铁球:《近代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第6页。

② 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140页。

③ 李智宇:《民国时期新疆人口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第2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〇一四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〇一四年)》,第10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〇一四年)》,第27页。

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编委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第71页。

⑧ 其余11兵团分别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湖北生产建设兵团。两个建设师为西藏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广西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不过,1975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被撤销。1981年12月,中央政府决定恢复兵团建制,名称由原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要抓手,是“新疆社会稳定、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一支可靠的重要力量”^①。除了号召军队直接转业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也多次组织内地民众落户新疆,向新疆各地区、各单位补充了生力军,进一步扩大了新疆的人口规模与生产规模。

对于新疆的治理,毛泽东同志精辟地总结道:“历史证明,在新疆必须屯垦和戍边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完成保卫边疆与建设边疆的重任。”^②然而屯垦和戍边都需要大量的人口作为载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人虽消耗资源,但也是物质产品的提供者。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人就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绝对生产力。中国疆域的扩展,伴随着人口的迁徙,由内而外形成人口的聚集地、文化的聚集地,也便形成了国家认同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但就人口的地域流动而言,“秦汉以后中国人口的迁移趋势一直没有改观,基本上都是从北向南迁移”^④。因而,若没有国家政权的介入与主导,以及为组织移民进行的财政投入,内地民众自发迁移新疆的动力远远小于迁往东北、西南边疆的动力。这仍是如今地方政府层面乃至国家层面,给予诸多优渥待遇吸引民众迁往新疆工作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军府体制在既往都护制度的基础上,“则更为重视深化组合格局、事权统一、军事布防、军民屯垦等制度内容”^⑤,使新疆在被收复后百余年内基本保持了“军务立而吏事修”^⑥的安宁局面。这主要是因为军府体制为新疆输送了大量的军民人口,既可以缓解内地的人口压力,又可以填补新疆的人口空缺,进而开展生产活动,解决新疆的物资供给问题。清代通过军府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将缓解人口压力与边疆治理有机结合,超越了以往朝代囿于治理成本而对新疆采取羁縻而治的策略。清朝“边防与屯政相维”^⑦的治疆方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疆建设方略提供了某种历史借鉴。

结 语

自张骞凿空西域后,新疆便被纳入我国大一统王朝的版图之内。然而由于新疆距内地遥远且交通阻隔,以及诸中央王朝势力强弱不一等因素,历代政权对新疆的管控时强时弱。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或以军事机构镇守,或仅令新疆地方政权称臣纳贡,甚至乾隆帝在第一次出兵伊犁的时候,还在计划沿袭治理成规:“然朕办理始意,亦惟欲按其四部,分封四汗,众建而分其势,俾之各自为守,以奉中国号令,聊示羁縻而已。”^⑧正是由于历代对新疆羁縻而治的治理模式,才致使“西域之不治,自上古至今数千载”^⑨。清代在新疆实行军府体制,直接把新疆纳入中央控制之下,移入大量永久驻防的八旗、绿营等军队,直接充实了新疆的地域空间,有力阻遏了俄国对新疆的侵略。在清代收复新疆前后,也是中国人口爆炸式增长的时期。清代统治者通过官为资送的方式迁移了大批内地贫民前往新疆屯垦,既缓解了内地的人口压力,又进一步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开发。

中国自古虽有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但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核心症结在于人地矛盾突破了土地承载极限,无法供养当时人口,进而引发规模不等的社会动乱。这些动乱引发的人口迁徙反而成为历史常态,形成了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流布。人口迁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官方主导的,一种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然而新疆地域广大,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且交通阻隔,人口迁徙难度极大。远途迁徙非个人所能承受,需要国家力量的有效介入与引导,方能进行远距离的人口迁徙。清代通过驻防八旗的方式进行移

① 李福生、方英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第23页。

② 包雅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第4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35页。

④ 林宪生、王钦:《中国古代北人南迁高潮的成因变化——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地理教学》2012年第10期。

⑤ 王希隆:《新疆军府制的创立、发展与深化——以西汉、唐、清三朝为中心》。

⑥ 杜宏春校证:《刘锦棠奏稿校证(上)》第6卷,中华书局,2019,第361页。

⑦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21卷,第3509页。

⑧ 郭平梁、纪大椿原辑,周轩、修仲一、高健整理订补:《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二)》,第1107页。

⑨ 魏源:《圣武记》第4卷,第159页。

民,既具有充当军事镇守的战略作用,也具有移民就食的治理效能,对治理新疆具有显著意义。

纵观中国历史,自夏代以来,从五方之民与华夏族群的政治、经济互动来看,移民始终是社会统合最有效的途径,也是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各民族通过移民嵌入的方式实现交流交往交融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①边疆是我国多民族聚集地,也是历史上民族地方割据政权最易滋生的地区。至清代,才真正将自古以来历代王朝治理最为薄弱的边疆地区统合起来,奠定了我国如今的版图格局。清代统治者对新疆实施的军府体制是古代王朝治理新疆最有效的路径,至今仍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时至今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及国家将新疆打造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②的战略布局,新疆面临着较大的人口缺口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吸引流动人口,以促进产业发展,带动当地就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然而新疆僻处西北,很难吸引大量省外民众自发迁移。这仍需资源调配和政策倾斜,激发内地民众移居新疆的外生动力和热情。同时,在新时代,人口流动对迁入地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让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在新疆人口流动中发挥显著导向作用,确保移民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得到切实的保障,并与当地居民和谐共处,仍是新时代新疆地方政府与国家层面需不断探索和优化的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 马毓】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2版。

② 人民日报评论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2023 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24,第308页。

tier. By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demographic changes in the frontier and the underlying issues of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peoples, a deepened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this ancient city site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 Ancient City site at Tuchengzi in Helinger County; Chengle County; Dingxiang Commandery; Yunzhong Commandery; frontier governance;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The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of Immigrants under the Military Garrison System in Xinjia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GAO Ya-xi

Before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Xinjiang, locating in the remote northwest, was isolated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After Zhang Qian's mission to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Western Han, the control of Xinjiang by the central dynast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fter pacifying the Junggar rebellion, the Qing Court abandoned the previous loose-rein policy while adopted a military garrison system in Xinjiang, in order to directly incorporate the region into its territory and control the large-scale immigration. The immigration in Xinjia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as mainly military immigration, supplemented by civilian immigration. Adopting the military garrison system not only quickly repopulated the war-torn areas of Xinjiang but also achieved tangible results in consolidating the border through large-scale land reclamation. Such an immigration strategy under the military garrison system provided a governance path for Xinjiang that both inherited the past and opened up the future, representing an organic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frontier governance. Moreover, it still holds significant referential value for the Xinjiang governance.

Key words: Military garrison system; frontier governance; immigration; population pressure; the Qing Dynasty

The Chinese Logic of the Modernization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and Historical View

LI Hai-lin

Modernization is a universal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a's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interrelated and progressively deepening historical stages, presenting a unique political logic. The late Qing experienced a feudal modernization dominated by the imperial clan and old bureaucrats; the Republic of China saw a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dominated by warlords and new bureaucrats; an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has been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he differences in leading forces,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modernization orientations have not only led to different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of change, but also implied 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s across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effectively embodies the developmental logic of "authority-organization-the people", that is,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provides political authority steering the direction of modernization;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mass line contribute a powerful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the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grants important value support to modernization. Examining China's grand history and re-examining the deep logic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can help to deepen the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diversity and universalit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Grand historical view;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entral force; socialism; the Chinese logic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and Its Shaping Mechanisms

LI Ran

The "New Generation" is a vital force driving social progress, embodying the abundant vitality for promoting cultural innovation. Rooted in the profound foundations provided by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practical feasibility and value necessity, transforming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 from a blueprint into reality is nothing less than the historical continuation assumed by this "New Generation" within the coordinates of the era, the subjective contribution of "realistic individuals" within the coordinates of agency, and the future extension of spiritual, practical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along the axis of civilization. Only by situat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New Generation" within the overarching perspective of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 and by dialectically grasping the interweaving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convergence of the national and the global,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pholding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as concretely manifested in basic lifestyles patterns, practical interactions postures, and core spiritual forms, can the full significance of this concept be comprehensively revealed. Subsequently, through construction of mechanisms for demand and supply, cultural educatio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guidance and restraint, we can effectively activate the endoge-